



# 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基于河南省的分析

郑新业 郭 璘

### 一 引言

伴随着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总体上呈扩大趋势，201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41.4<sup>①</sup>。部分研究结果表明，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刺激投资和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较大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则会阻碍经济增长，如导致政治不稳定，易爆发金融危机和减少社会流动性等。因此，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成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因素、政策影响、文化和环境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等五个方面（Anneli Kaasa, 2005）。经济发展程度包括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水平。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典型如库兹涅茨曲线，但也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或不显著的；但技术进步水平将会恶化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Timothy F. Bresnahan, 1999; Dennis J. Snower, 1999）。人口因素包括城市化水平、年龄结构、家庭构成和受教育程度，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就受教育程度而言，理论上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收入水平将会越高，但这可能导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的收入更高，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的收入相对较低，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相反，这也可能是收入较低的群体提高收入水平的途径之一，从而缓减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影响因素包括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税收制度和民主化程度。公共支出有再分配和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但是，若公共支出较多地投入在工业等有利于较富裕人群的项目建设上，而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时，可能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Mario I. Blejer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计算。

and Isabel Guerrero, 1990)。也就是说，公共支出的结构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有一定的影响。税收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我们希望利用税收制度能够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但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是不确定的或者不显著的。与公共支出相似，单一税种和税收结构都会对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不同的影响。民主化程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或者不显著的。文化和环境因素包括文化传统、土地集中度、腐败和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最后，宏观经济因素包括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金融业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方面，普遍认为金融发展程度提高将降低收入分配差距，而对外投资增加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在上述诸多影响因素中，我们主要考虑财政政策因素。良好的财政政策被认为是能够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缓解贫困和不平等的工具。然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典型如拉丁美洲，税收、转移支付（如津贴、社会救助和失业保险等）和公共支出（如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等财政政策对于减贫和降低不平等的效果并不明显（Jeffrey Puryear and Mariellen Malloy Jewers, 2010）。在财政收入侧，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被广泛地讨论。一般地，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上，税收的调节作用是比较弱的，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其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小（Jorge Martinez-Vazquez, 2001）。在我国，对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李吉雄（2010）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而王亚芬等人（2007）认为2002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逐渐发挥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减少了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对于间接税而言，刘怡和聂海峰（2004）考察了广东省2002年城市居民的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负担，税前和税后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33.39和35.58，<sup>①</sup>从而恶化了收入分配。在税收结构的分析上，李绍荣和耿莹（2005）认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在财政支出侧，大部分国内外研究认为，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收入平等化和减贫有积极作用。社会保障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也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Jorge Martinez-Vazquez et al., 201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没有调节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常规的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并不能专门惠及收入较低的人群（Gerd Schwartz and Teresa Ter-Minassian, 2000）。此外，学者们普遍认为，转移支付是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有效手段。但是，在我国，也有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支付未能有效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黄祖辉等，2003；朱国才，2007），反而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黄祖辉等，2003）。从现有研究来看，在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这一问题上的探讨并未达成共识，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

<sup>①</sup> 数据来源：刘怡，聂海峰，间接税负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5），pp.28

与 OECD 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恶化收入分配的现象。在 2000 年代后期，OECD 国家平均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为 40.3 和 30.0，部分主要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亚洲国家日本的税前基尼系数都明显高于其税后基尼系数。这五个国家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分别为美国 45.6 和 36.9，英国 46.5 和 33.3，法国 35.1 和 27.4，意大利 43.4 和 32.9，日本 40.6 和 32.3。另一个亚洲国家韩国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变化幅度较小，为 33.0 和 30.9。<sup>①</sup>李吉雄（2010）分别计算了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在享受财政政策前后的收入差距。2008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34.09 和 33.93；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人均现金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32.84，37.13 和 37.73。<sup>②</sup>我国 2002 年以来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如下。对城镇居民而言，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略微低于人均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对农村居民而言，其人均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明显较低。这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而恶化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

表-1.1 2002-2008 年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作用<sup>③</sup>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城镇居民							
人均总收入	31.79	32.86	33.68	34.2	33.83	33.32	34.09
人均可支配收入	31.58	32.61	33.38	33.9	33.56	33.15	33.93
农村居民							
人均总收入	32.35	33.03	32.69	32.39	32.46	33.26	32.84
人均现金收入	37.88	38.37	38.54	37	36.64	37.46	37.13
人均纯收入	37.14	38.12	36.93	37.58	37.32	37.36	37.73

<sup>①</sup>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Surveys: Norway[R], February 2012, pp.11

<sup>②</sup> 数据来源：李吉雄，我国财政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绩效分析[J]，经济问题，2010（12），pp.27-28

<sup>③</sup> 数据来源：李吉雄，我国财政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绩效分析[J]，经济问题，2010（12），pp.27-28

我国财政政策的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并且出现了恶化收入分配差距的现象。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分析河南省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其存在恶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文章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我国 1994 年以来全国财政收支状况的描述；第三部分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趋势和国际比较；第四部分是河南省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绩效测度；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 二 我国财政政策现状

1994 年税改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均保持着高速增长。1994 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分别为 5218.10 亿元和 5792.62 亿元；至 2011 年，我国财政收入规模上升至 103874.43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9.4%；财政支出规模达到 109247.8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9.2%。下图反映了 1994 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增长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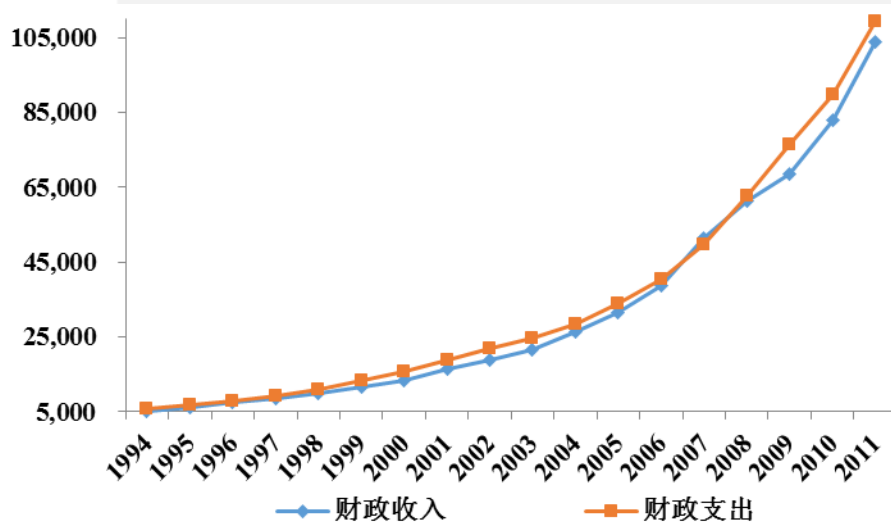


图-2.1 1994-2011 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收支规模（亿元）<sup>①</sup>

此外，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逐年上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表现出超过经济增长率水平的上升幅度。1994 年到 2011 年间，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0.83% 上升至 21.97%；财政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2》。统计数据中，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从 2000 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

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12.02% 上升至 23.10%。这表明，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公共部门的规模也呈现了明显的扩张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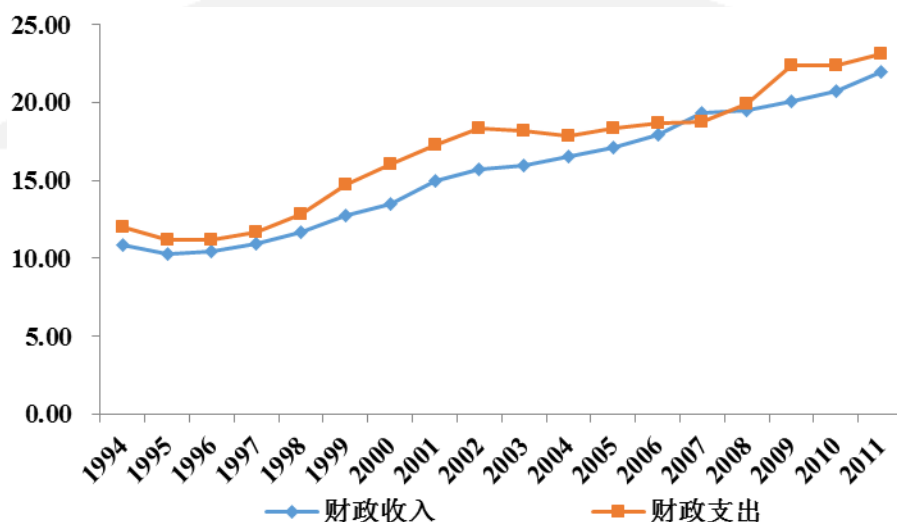


图-2.2 1994-2011 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收支占 GDP 的比重 (%)<sup>①</sup>

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被广泛地讨论。在财政收入方面，主要讨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等主要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财政支出方面，主要讨论社会保障支出、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将对我国税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做出描述。

在财政收入侧，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94 年，该比重为 98.25%，2006 年，该比重下降为 89.79%，至 2011 年，该比重为 86.39%。在税收收入中，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国内消费税以及个人所得税之和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了 90%（2011 年），是最主要的税种。2011 年我国税收结构如下：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国内消费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7.04%，18.69%，15.24%，15.11%，7.73% 和 6.75%。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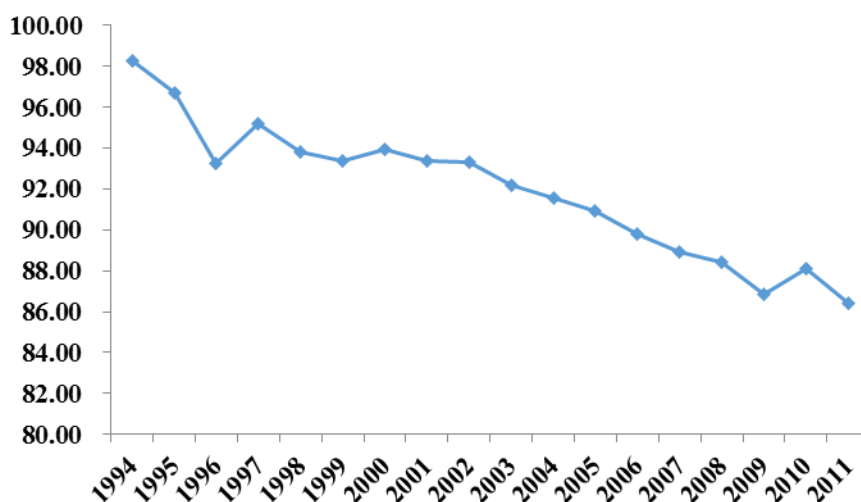


图-2.3 1994-2011年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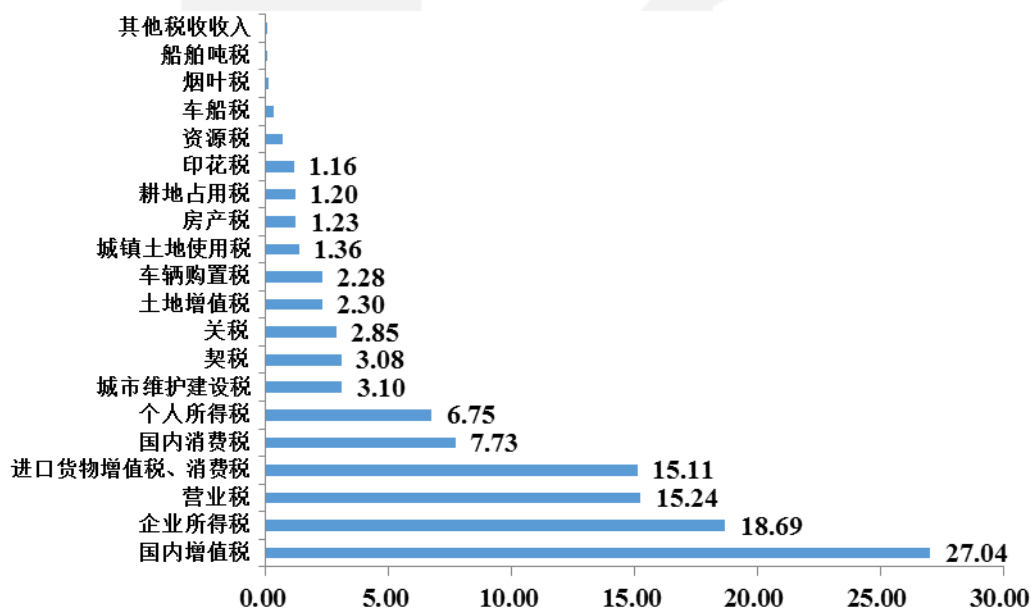


图-2.4 2011年各税种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 (%)<sup>②</sup>

下图反映了主要税种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的变化情况。历年来，国内增值税收入所占比重较高，但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1994年，该比重为45.02%，2011年下降为27.04%，下降了17.98%。企业所得税收入的统计口径在2001年前后有所调整。<sup>③</sup>2001年以来，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比的波动较大，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sup>②</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sup>③</sup> 企业所得税2001年以前只包括国有及集体企业所得税；从2001年起，企业所得税还包括除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外的其他所有制企业所得税，与以前各年不可比。



在 2003 年下降至 14.58%，2006 年和 2008 年该比重超过 20%，2011 年回落至 18.69%。营业税收入在 1998 年到达 17%，在 2002 年下降为 13.89%，此后在 14%-15% 左右小幅波动。国内消费税收入在 2008 年及以前经历了平稳下降的过程，2008 年，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 4.74%，2011 年上升至 7.73%。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自 2001 年起稳定在 6.5%-7%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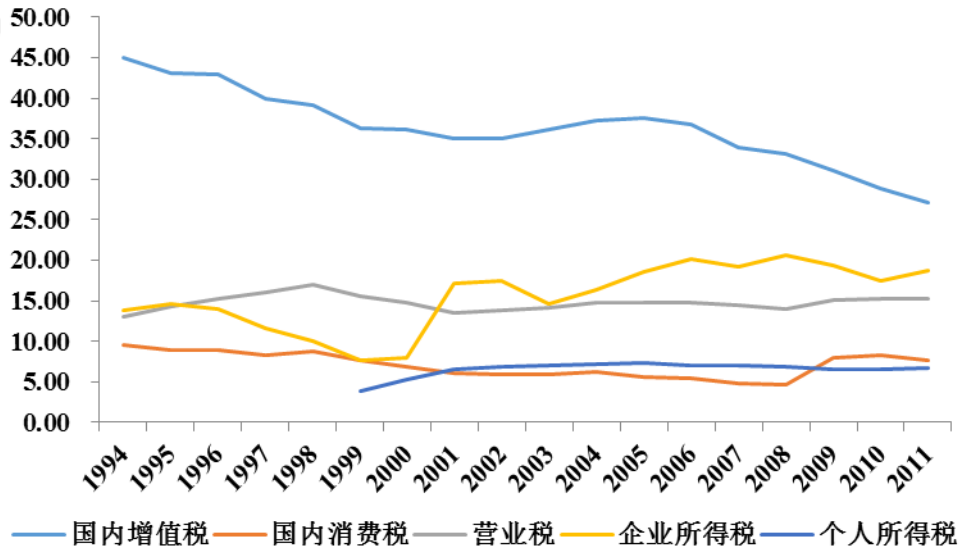


图-2.5 主要税种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例 (%)<sup>①</sup>

在财政支出侧，2007 年前后，财政支出各项目的统计口径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将仅关注 2007 年后的财政支出结构及其变化。财政支出中的主要项目包括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2011 年，上述四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15.10%，10.17%，10.06% 和 9.10。此外，在影响收入分配的讨论中常包括的医疗卫生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5.89% 和 3.50%。

2007 年以来，主要支出项目和我们所关注的医疗卫生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的变化情况如下。教育支出占比变化幅度不大，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 2009 年的 13.70% 和 2011 年的 15.10%，但从 2009 年开始，教育支出额度超过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稳定在 10% 左右。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出现明显的下降，从 2007 年的 17.10% 下降至 2011 年的 10.06%。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呈上升趋势，2011 年，该比重为 9.10%。此外，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也逐年上升，从 2007 年的 4.00% 上升至 2011 年的 5.89%。住房保障支出占比在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上升速度较快，该比重分别为 0.95%，2.64% 和 3.50%。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2》。

我国公共部门的规模不断增大。在财政收入侧，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要税收来源，这一类间接税被普遍认为具有累退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在财政支出侧，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所占比重较大，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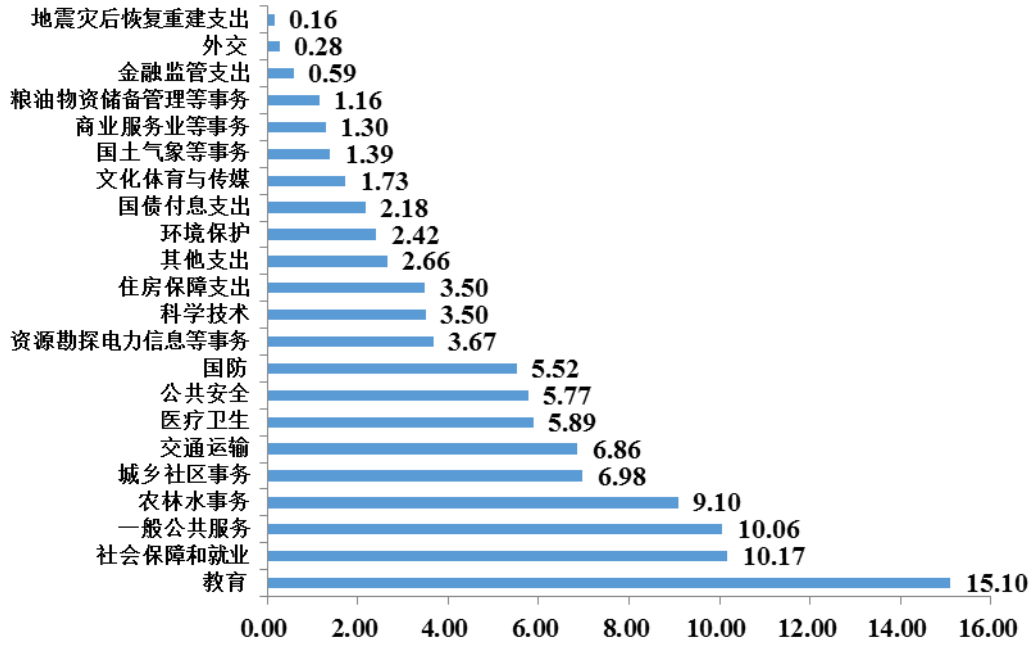


图-2.6 2011年各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sup>①</sup>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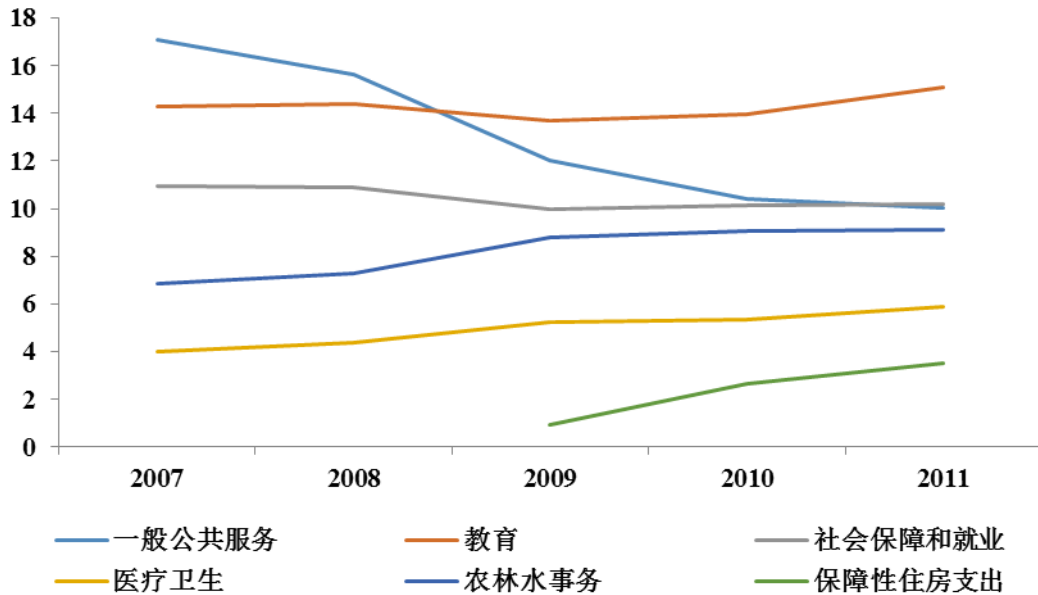


图-2.7

主要支出项目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sup>①</sup>

### 三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趋势

图-3.1 是 1952-2010 年全国基尼系数的历史趋势，展示了近六十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趋势。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近六十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改革开放以前波动较大，但整体收入差距较小；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虽然部分年份有小幅回落，但并没有形成收入分配差距下降的趋势。基尼系数由建国初期的 22.4 增至 2010 年的 41.4，增加了 84.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近六十年中，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出现过四次峰值，分别是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76 年）、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时期以及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期（2009 年）。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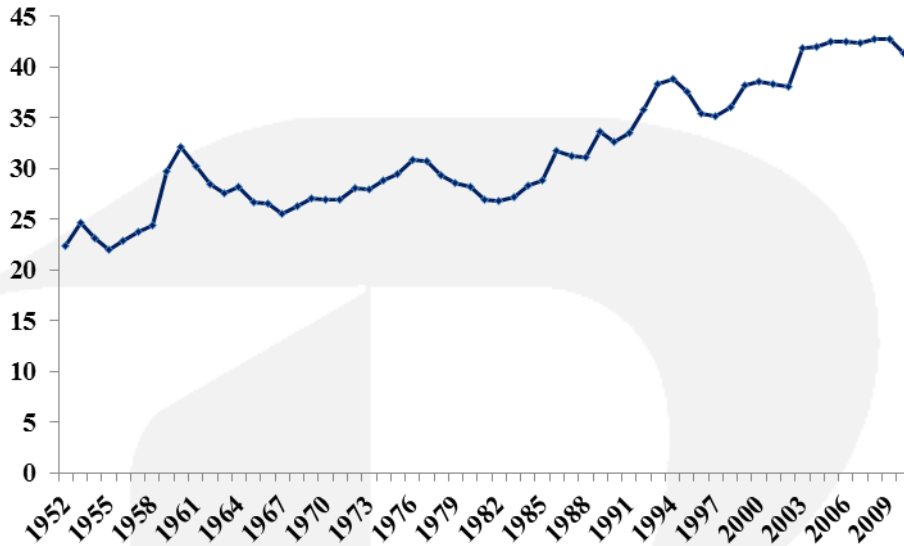


图-3.1 1952年-2010年全国基尼系数历史趋势<sup>①</sup>

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期间（1956年以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小。但在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快速上升，并于1960年达到一个极大值点32.2。在饥荒后的农业恢复时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得到缓解，并于1967年到达一个极小值点25.5。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1976年再一次达到一个极大值点。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制期间（1979-1984），收入分配差距得以缓解30.9。1984年后，随着中国政府分权、对外开放，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稳步、快速增加，并于2009年基尼系数达到42.7，超过联合国有关部门设定的警戒线40.0，虽然部分年份有小幅回落，但并没有形成收入分配差距下降的趋势。

此外，我国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在不断扩大，但农村的收入分配差距较之城市内部的更为严重，城镇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速度大于农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17.7增至2010年的30.9，增加了74.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24.5增至2010年的35.5，增加了44.9%。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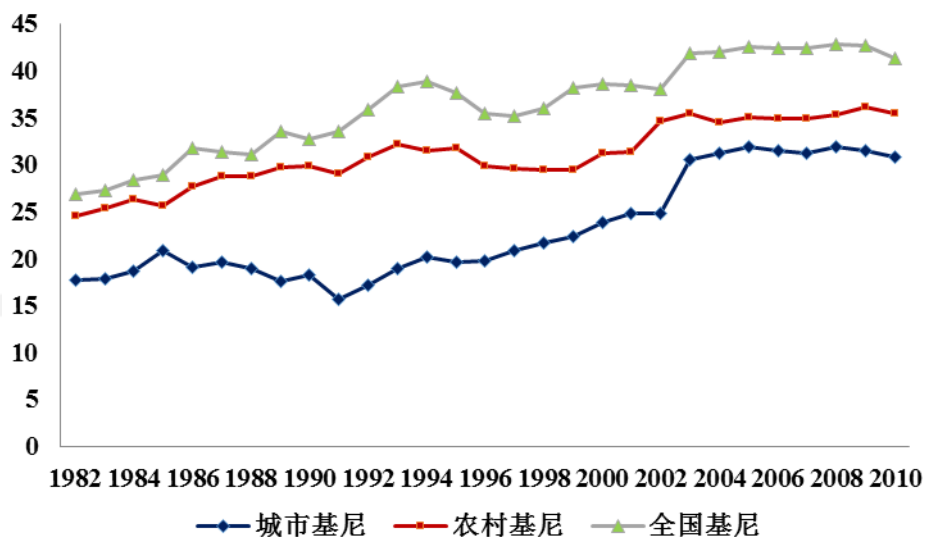


图-3.2 1982-2010年全国、城市、农村基尼变化趋势图<sup>①</sup>

除基尼系数外，收入分配差距可以用分等级收入户的收入情况来衡量。城镇居民家庭现金收支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七个等级。计算 1986-2011 年各收入等级的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并经城市 CPI 调整，得到 1990-2010 年各收入等级的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1997 年和 2002 年，最低收入户的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减少 3.0%和 9.83%；2002 年，低收入户的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减少 0.42%。1996 年，各等级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均下降，最低收入户为 9.43%，低收入户为 7.59%，中等偏下收入户减少 7.69%，中等收入户减少 6.89%，中等偏上收入户减少 6.36%，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分别减少 6.17%和 6.23%；2002 年，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下降 13.07%和 4.38%。除此之外，各个等级收入户实际的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均不断增长。计算各收入等级的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明显看出收入水平越高的城镇居民享有相对更高的收入的增长率。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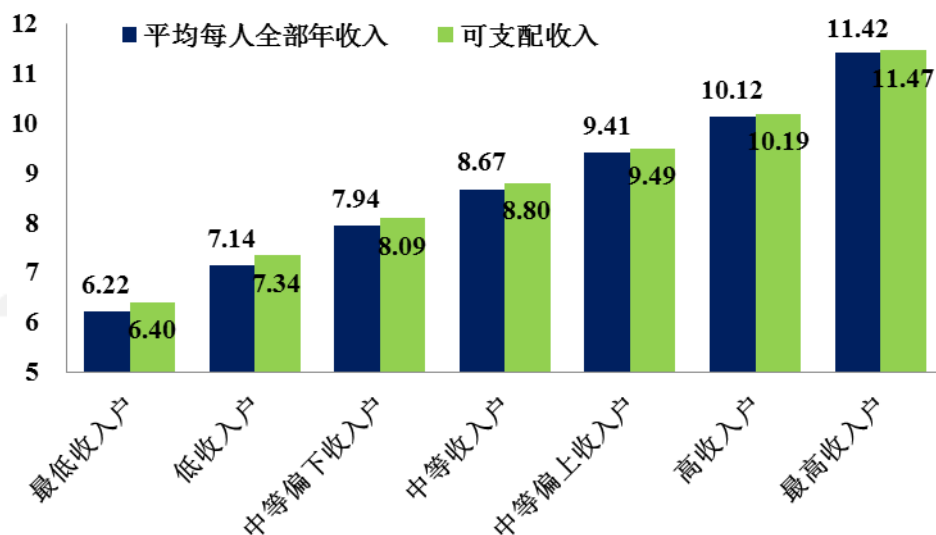


图-3.3 各收入等级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sup>①</sup>

为分析历年来（1985-2011）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将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作比。从下图可以看出，1985-2001年和2002-2005年两阶段上，该比值平稳上升；2001-2002年上升幅度较大，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的比值从5.37上升至7.99，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从5.39上升至7.89；2006年至今，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但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仅从2005年的9.25下降为2011年的8.24，可支配收入仅从2005年的9.18下降为2011年的8.56。需要指出的是，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与每人全部年收入的比值相比，差距不大，且在部分年份前者较高。这意味着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没有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况，反而恶化了收入分配情况。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的数据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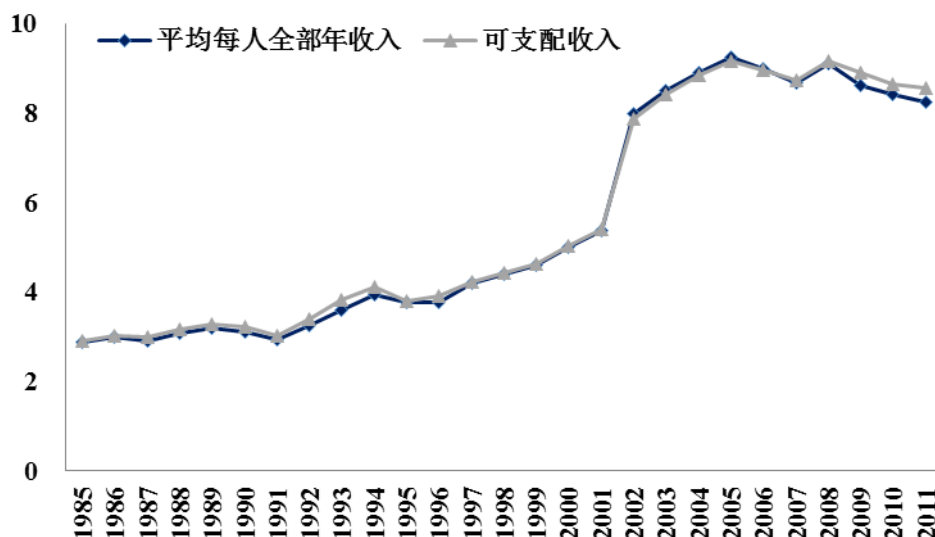


图-3.4 历年最

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之比<sup>①</sup>

工资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分析我国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变化趋势和差异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是有利的。1995年以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3.70%；各行业工资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仅在2003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平均工资下降0.41%。从各行业的年均增长率来看，采掘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业和国家机关的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年均增长率最低的为农、林、牧渔业（11.02%），最高的为金融、保险业（16.30%）。经城市CPI调整后，得到我国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实际增长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1.68%。除1996年，建筑业的实际平均工资下降0.34%，2003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实际平均工资下降1.31%外，各行业历年的实际平均工资呈上升趋势。我国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如下图：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的数据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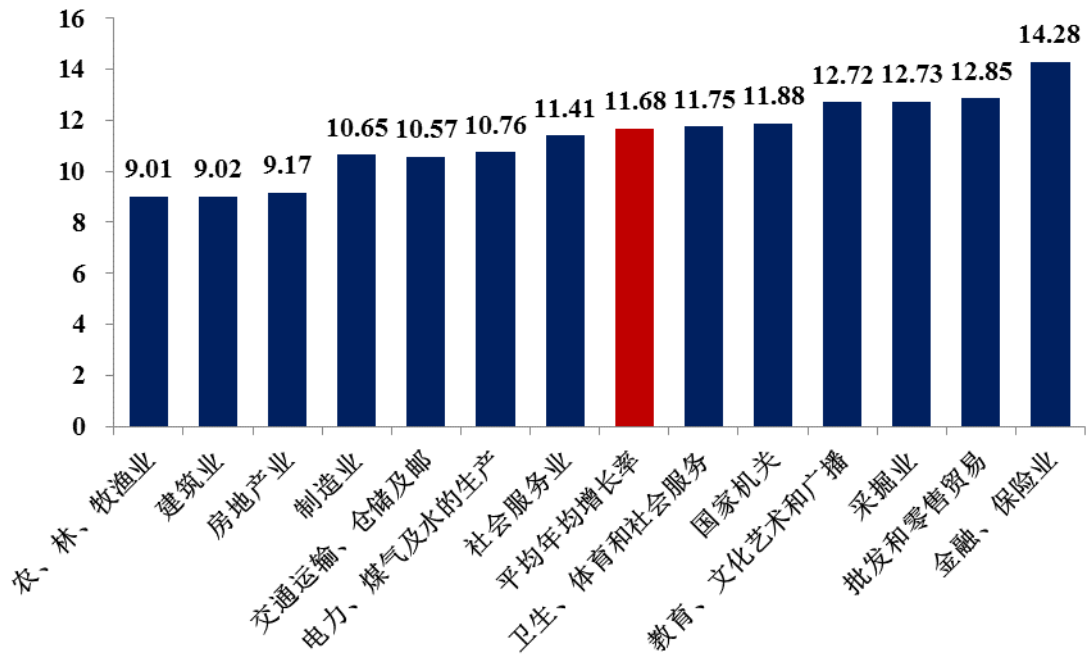


图-3.5 我国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sup>①</sup>

将 1996-2010 年，农、林、牧渔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sup>②</sup>做比较（图-3.6）。在大多数年份，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远高于农、林、牧渔业，2005 年，二者增长率的差异达到 10.82%，在 1996、2009 和 2010 年，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超过金融、保险业，但幅度很小。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sup>②</sup> 比较平均工资的名义增长率即可。因为平均工资的实际增长率由城市 CPI 调整，不影响两个行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相对变化幅度及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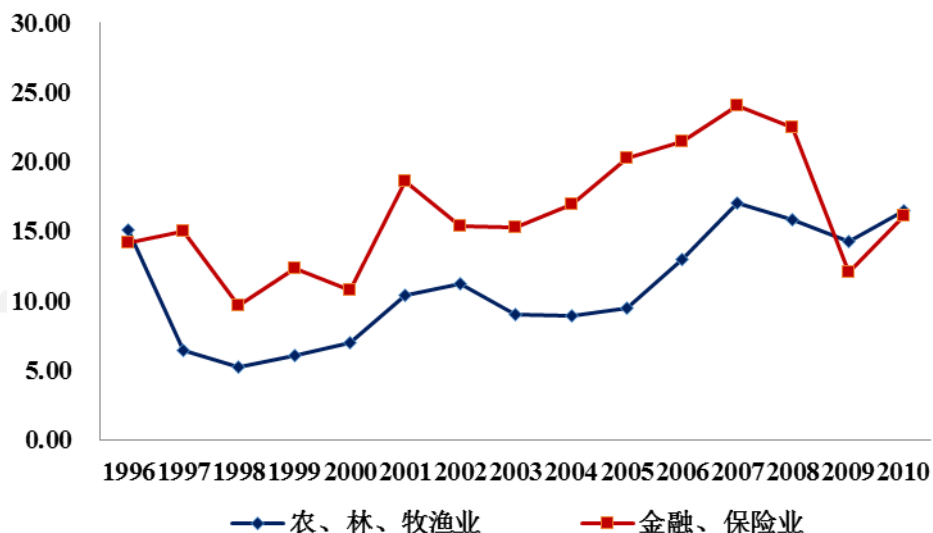


图-3.6 农、林、牧渔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比较<sup>①</sup>

将各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 增长率做比较<sup>②</sup>，若平均工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则可以认为该行业的就业人员分享了经济发展的好处。1996 年以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率在 1998-2003 年和 2009 年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从各个行业来看，按平均工资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年份由少至多排列，依次为建筑业，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国家机关，采掘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金融、保险业。<sup>③</sup>

最后，为分析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主要就历年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进行对比。1995 年以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始终是农、林、牧渔业；在 1995 年和 1996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1997 年以后，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一直是金融、保险业。1996 年，最高平均工资为 8803 元，最低平均工资 4045 元，二者之比最低，为 2.18；2008 年，最高平均工资为 53897 元，最低平均工资 12560 元，二者之比最高为 4.29。可见，虽然各行业工资不断上涨，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也不断扩大。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sup>②</sup> 比较名义增长率即可。因为实际增长率由 CPI 或城市 CPI 调整，不影响平均工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幅度及趋势。

<sup>③</sup> 详细数据参见附录 附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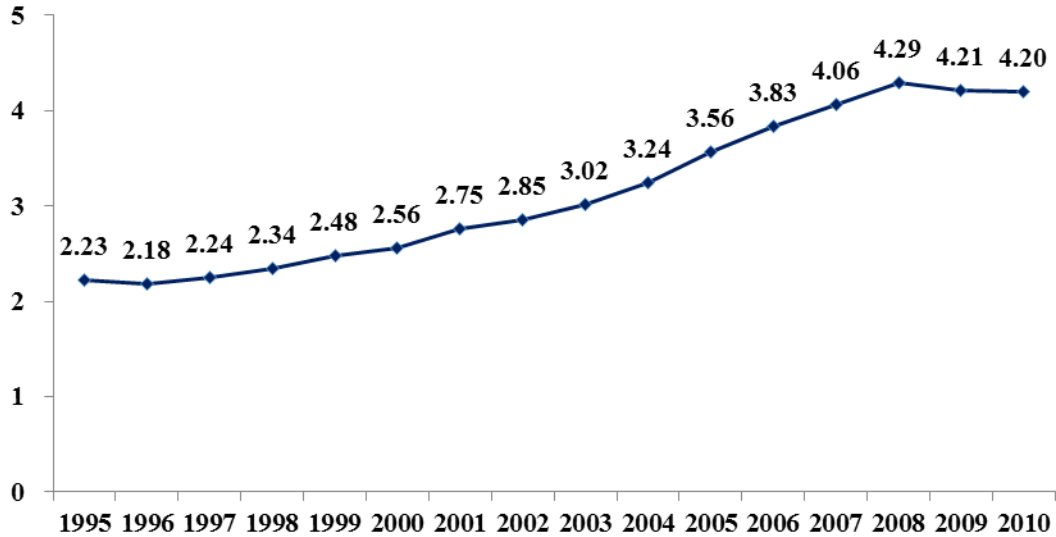


图-3.7 历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的变化趋势<sup>①</sup>

## 四 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一) 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分解

我们采用分解法来研究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首先将居民收入分解为劳动性收入、资本存量收入、转移性收入、个人所得税支出以及个人社会保障支出五个部分，选取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比值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指标。其中劳动性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净收入<sup>②</sup>，这部分收入差距主要是不同行业、不同工种所致，国家可以通过开放垄断性行业以及提高教育支出等手段来进行调节；资本存量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等）以及出售财物收入，这部分收入差距来自于不同的居民资本存量，可以通过增加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政策进行调节；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是我国财政支出侧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主要手段；而与此相对应的个人所得税支出、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是我国财政收入一侧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对可支配收入的贫富差距进行分解可得如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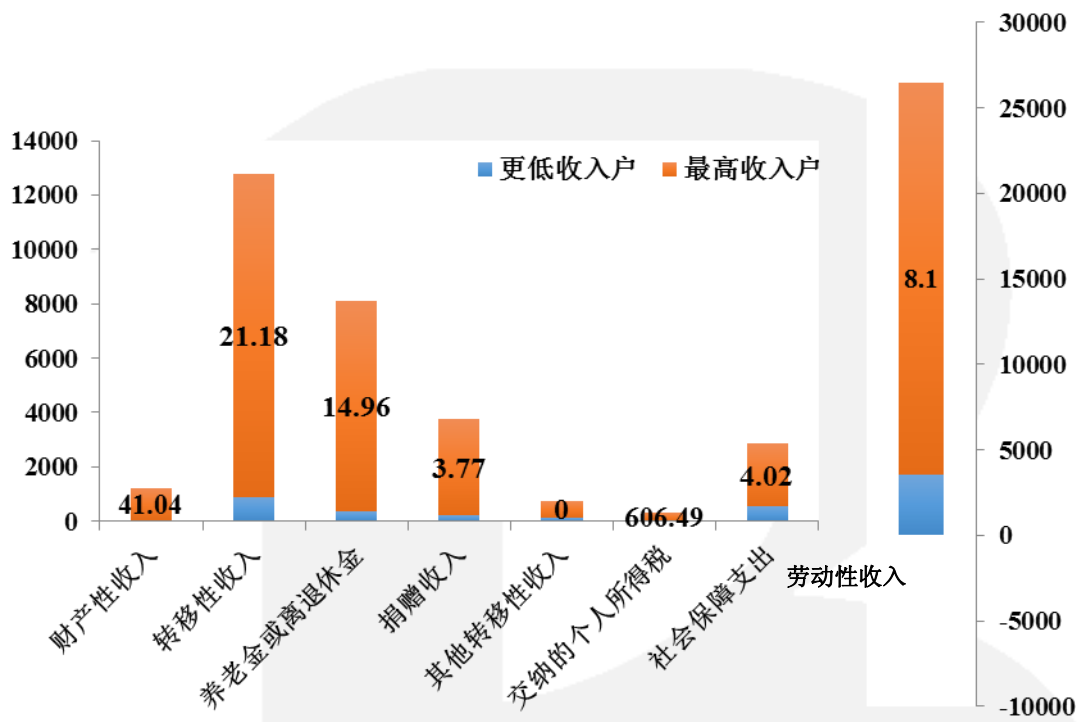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sup>②</sup> 家庭收入中的经营净收入实质家庭成员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是全部生产经营收入中扣除生产成本和税金（但不扣除个人所得税）后所得的收入。一般为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主所获得的收入。

$$\begin{aligned}
\text{可支配收入衡量贫富差异} &= \frac{\text{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text{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
&= \frac{\text{可支配收入}_R}{\text{可支配收入}_P} \\
&= \frac{\text{劳动性收入}_R + \text{资本存量收入}_R + \text{转移性收入}_R - \text{个人所得税}_R - \text{个人社会保障支出}_R}{\text{劳动性收入}_P + \text{资本存量收入}_P + \text{转移性收入}_P - \text{个人所得税}_P - \text{个人社会保障支出}_P} \\
&= \frac{\text{劳动性收入}_R}{\text{劳动性收入}_P} \times \frac{\text{劳动性收入}_P}{\text{可支配收入}_P} + \frac{\text{资本存量收入}_R}{\text{资本存量收入}_P} \times \frac{\text{资本存量收入}_P}{\text{可支配收入}_P} + \frac{\text{转移性收入}_R}{\text{转移性收入}_P} \times \frac{\text{转移性收入}_P}{\text{可支配收入}_P} \\
&\quad \times \frac{\text{转移性收入}_P - \text{个人所得税收入}_R - \text{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收入}_R}{\text{可支配收入}_P - \text{个人所得税收入}_P - \text{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收入}_P} \\
&\quad \times \frac{\text{可支配收入}_P}{\text{可支配收入}_P}
\end{aligned}$$

概括而言，可支配收入贫富差距可以分解为每一类收入的贫富差距的加权平均，权重为更低收入户中每一类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一比重也反应了不同类型收入的贫富差距对整体可支配收入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

由于我国统不按收入分组统计各组现金收支情况，因此我们选择一个典型的省份——河南省进行分析。200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解的结果如图-4.1所示，最高收入组与更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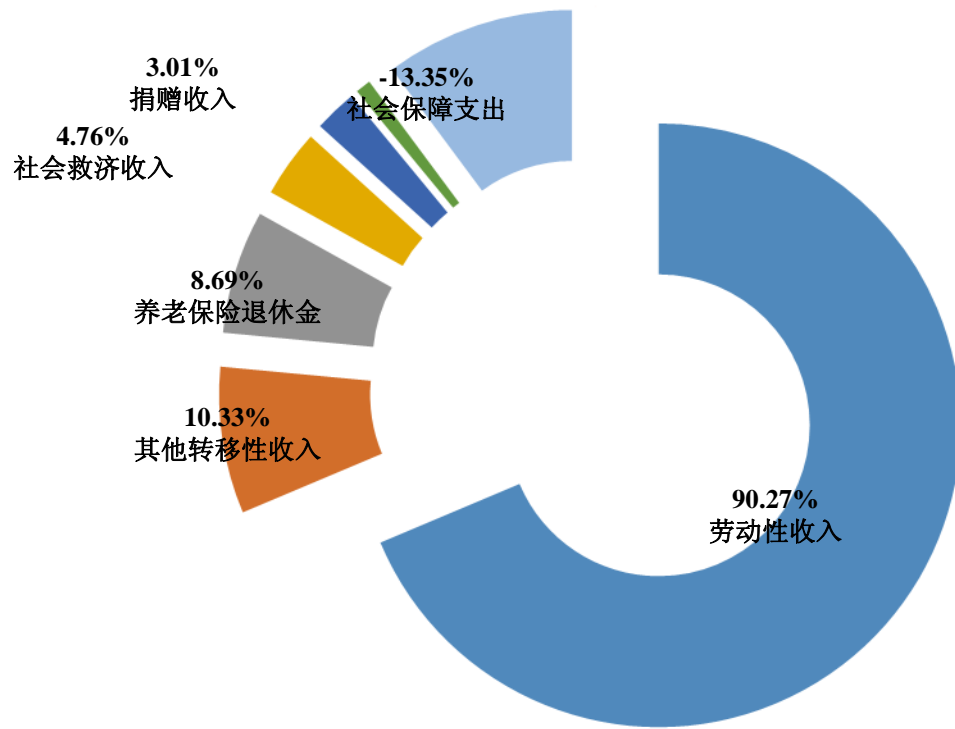


(1) 每一类收入的贫富差距<sup>①</sup>

1.08%  
财富存量收入

-0.01%  
税收支出

<sup>①</sup> 每一类收入的贫富差距：最高收入户的该类收入/更低收入户的该类收入。



(2) 每一类收入所占的权重<sup>①</sup>

图-4.1 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

<sup>①</sup> 每一类收入所占的权重：更低收入户中每一类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具体来看我们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有以下几个特点：

#### （1）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过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过窄

虽然高低收入户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比高达 606，但是这一政策的收入分配再调节功能非常低，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仅有 0.01%，即使是年人均收入 40000 元以上的更高收入群体，一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有 266 元。

#### （2）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恶化收入分配

更低收入户所缴纳的个人社会保障性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 13.35%，也就是说个人社会保障性支出的贫富差距对整体贫富差距的影响因子达到 13.35%，是除劳动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外，对整体贫富差距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但高低收入户的这一项支出比值仅为 4.02，远远低于整体贫富差异 9.86。换言之，这一项支出是一项累退性支出，低收入户所缴纳的金额要高出按其收入等比缴纳的一倍。

#### （3）股利、红利等在税率上被优待，缺少遗产税和赠与税

资本存量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极大的恶化了城镇居民贫富差异。资本存量收入的贫富差距虽然对整体可支配收入的贫富差距影响因子较小，仅为 1.08%，但最高收入户高出更低收入户达 41.04 倍。转移性收入贫富差距对整体贫富差距的影响因子达 22.03%，是可支配收入中除基本的劳动性收入外最重要的一部分，其贫富差距达 12.17，显著拉高了整体贫富差距，其中退休金养老金高低收入户之比达 21.18，捐赠收入（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高低收入比值为 14.95。但是我国并没有相应的财产税或者资本利得税，在捐赠赡养收入方面，我国又缺少遗产税和赠与税，这就使得我国对这两部分贫富差异极大的收入毫无调节手段与措施。

#### （4）社会支出所占比重过低

社会救济性收入虽然并不被最高收入群体与更高收入群体享有，但是即使在收入最低的更低收入群体中，占比也仅有 4.76%。对于收入水平稍高的较低收入户，这一比重急速下降至 0.79%。可见这部分政策性补助的补助力度非常低。

### （二）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本身贫富差异就极大，但是我国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或者成效不彰，有些财政政策，例如我国的个人社会保障支出，甚至起到的恶化收入分配的作用。我们采用财政政策作用前后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值来进行比较，以此衡量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分

配公平性的影响程度。为了分别反映我国仅有的两项调节收入分配工具——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的作用，我们依次定义以下三个指标。

(1) 基于平均每人年实际家庭收入（元）的比值用以反映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text{政策前贫富差距} = \frac{\text{最高收入组的实际家庭收入}}{\text{最低收入组的实际家庭收入}}$$

(2) 基于平均每人财政补贴后的家庭收入的比值用以反映政府补助政策再分配后的公平性：

$$\text{政府补助后贫富差距} = \frac{\text{最高收入组的财政补贴后的家庭收入}}{\text{最低收入组的财政补贴后的家庭收入}}$$

(3) 基于平均每人年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用以反映政府补助、税收政策再次分配后的公平性：

$$\text{政策后贫富差距} = \frac{\text{最高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text{最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

计算的结果如下图-4.2所示，我们仍然采用代表性省份河南省来进行说明。在未经历任何财政政策之前，河南省城镇最富人收入与最穷人收入之比为 8.49，或仅考虑财政补助政策对其的影响，则这一比值变为 9.93，升高 1.44，反应了财政补助政策对公平性的恶化程度；若同时考虑财政补助、税收政策的影响，这一比例变为 9.86，比单纯财政补助的影响降低了 0.07，反应了税收政策对公平性的微弱改善情况；与初始财富分配状态相比，这一比值升高了 1.38，反应出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看恶化了社会收入的公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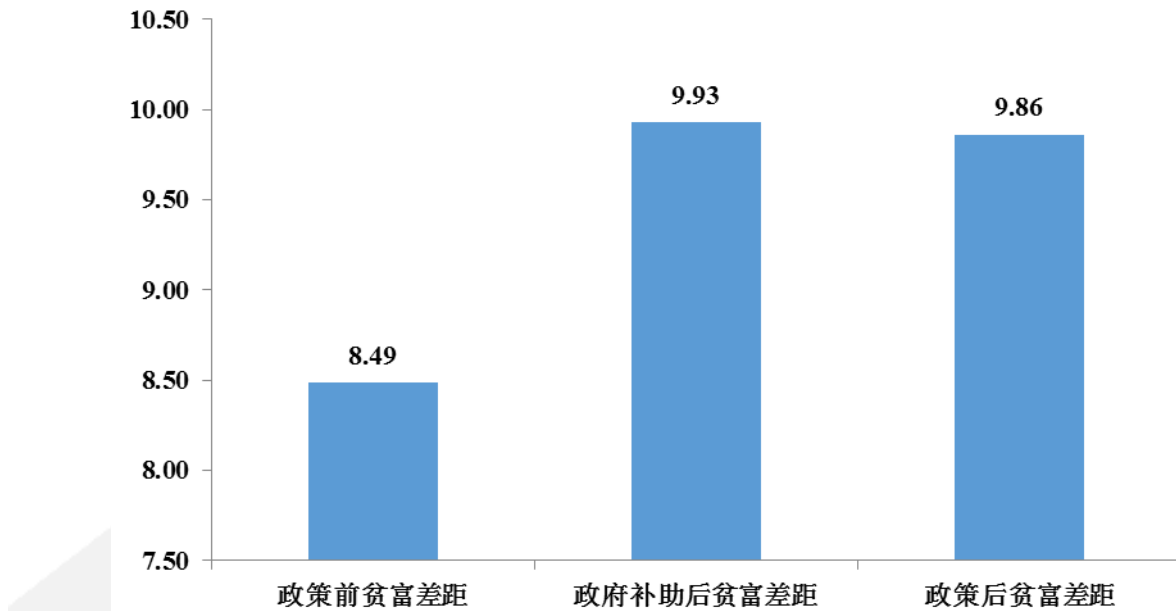


图-4.2 基于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比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除了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之比，我们还采用了基尼系数来对我们上面的结论加以辅助说明。同样，为了比较税收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实施前后的收入分配情况，我们设置了三个基尼系数：

(1) 考虑政府的财政政策之前的基尼系数。根据《2010 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的定义，我们得知统计年鉴中的“家庭总收入”是指调查户中生活在一起的所有家庭成员在调查期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总和的人均值，换言之，统计年鉴中的家庭总收入已经包括财政政策所提供的社会补助以及社会保障。因此，为了得到财政政策影响之前的基尼系数，我们首先要得到不包括政府补助等转移性收入的“实际家庭收入<sup>①</sup>” = 家庭总收入 - 转移性收入。然后，我们以此为基础，结合调查人数信息，计算得到财政政策之前的基尼系数。我们用 GINI1 表示；

(2) 仅考虑政府补贴、补助后的 GINI 系数，即不包含税收影响的基尼系数。我们按照公式“财政补贴后的家庭收入” = 家庭总收入 - 社会保障支出，而后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即为仅受政府补贴影响，而不受政府税收政策影响的基尼系数。我们用 GINI2 表示；

(3) 既考虑政府补贴又考虑政府税收政策的基尼系数。即根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sup>②</sup> 我们用 GINI3 表示。

基尼系数越高，则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越大，通过对比政策前后不同 GINI 系数之差，我们就可以判断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即：

政府补助、补贴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绝对值 = GINI2 - GINI1

政府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绝对值 = GINI3 - GINI2

政府全部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绝对值 = GINI3 - GINI1

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相对值 = (GINI3 - GINI1) \* 100 / GINI1%

结果为正，表示相应的财政政策恶化了收入分配情况，反之，表示财政政策改善了收入分配情况。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我们得到下表-4.1，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1) 我国城镇收入不平等情况的确较为严重，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指标，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的城镇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30；

(2) 中国的社会补助政策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虽然税收政策可以起到一定的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税收政策税基过窄，改善作用非常微弱。两项政策的总体影响仍然恶化了我国的收入分配情况。从表-4.1 左边那列数据看，如果不考虑政府补助，不考虑政府税收，那么全社会

<sup>①</sup> 为了反应一般家庭的收入情况而非调查家庭的收入情况，我们在家庭总收入中减去记账补贴。

<sup>②</sup> 根据《2010 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公式，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个人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记账补贴。



的基尼系数是 30.17，如果仅考虑政府补贴，不考虑政府税收，那么全社会的基尼系数是 31.21，这两个基尼系数相减，差为 1.045，就是政府补助对收入分配的恶化程度；如果同时考虑政府补助政府税收的影响，那么全社会的基尼系数为 31.10；这个基尼系数与 31.21 的差是-0.107，反应的是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微弱改善情况；31.21 与 30.17 之差为 0.938，反应的是全部两类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总体恶化情况。

表-4.1 2009 年河南省财政政策前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比较

基尼系数		政策影响	
#实际家庭收入 (GINI1)	30.17	财政补贴、补助 影响 (GINI2 - GINI1)	1.045
#财政补贴后的家庭 收入 (GINI2)	31.21	税收政策影响 (GINI3 - GINI2)	-0.107
#可支配收入 (GINI3)	31.10	全部财政政策影 响 (GINI3 - GINI1)	0.938

图-4.3是2009年河南省财政政策调节前后的基尼系数与国际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从图中将更为明显的看出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恶化程度。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非常严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显著高于丹麦、瑞典等发达国家，仅有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更为严重。更让人惊讶的是，除中国外，丹麦等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可以显著的改善居民的收入差距，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虽然效果不如发达国家显著，但是仍旧可以一定程度的对收入差距进行改善；而中国是上述所列举的国家中，唯一一个财政政策致使收入不平等更为恶化的国家。

我们可以使用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相对程度来反应财政政策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有效性。根据上面的公式，<sup>①</sup>我们得到图-4.4，即各个国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从下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最高的比利时在 2003 年，其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程度将近 50%，非常显著的改善了比利时国内贫富差距问题，即使政策效率最低的秘鲁在 2004 年，政府政策对整体贫富差距也有 1.34% 的改善。与这些国家相比，仅有中国，政府的政策使得收入分配恶化了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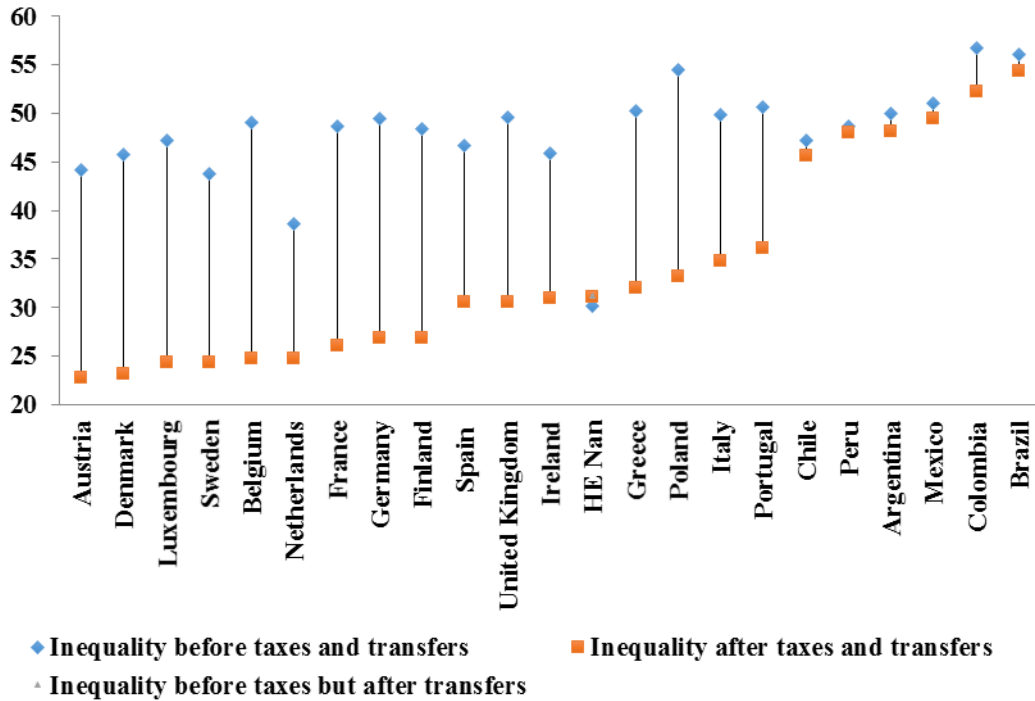


图-4.3 2009年河南省财政政策调节前后的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与其他国家的对比

<sup>①</sup> 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相对值 =  $(GINI3 - GINI1) * 100 / GINI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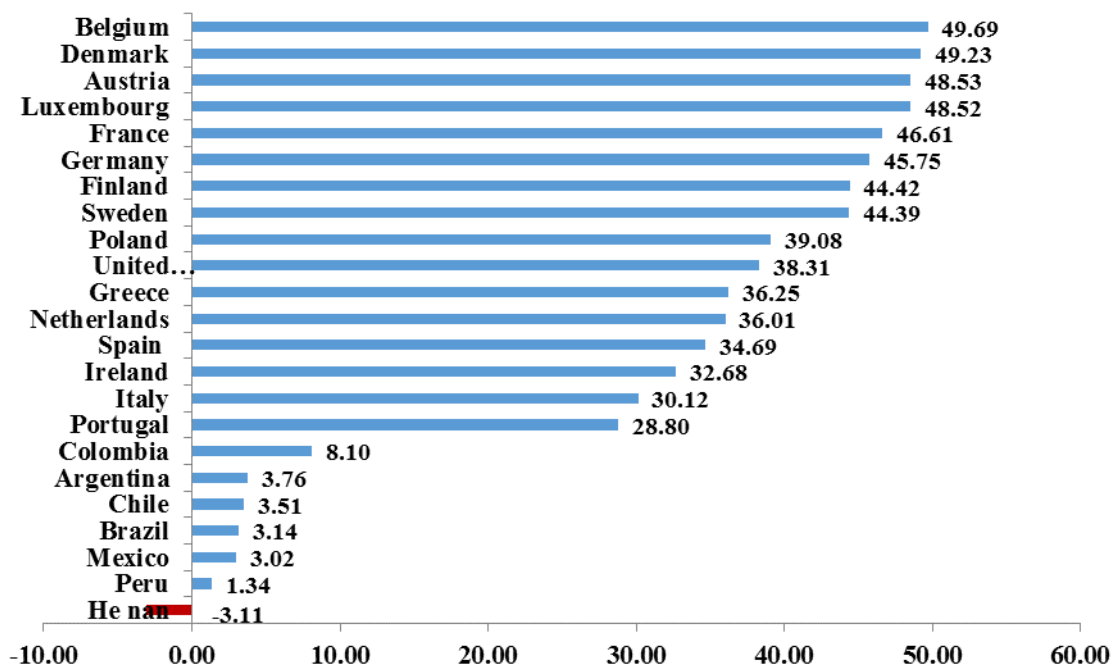


图-4.4 各国家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的有效性

## 五 结论

伴随着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总体上呈扩大趋势，201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41.4。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甚至出现了恶化收入分配的现象。1994年税改以来，我国公共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财政收入侧，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要税收来源，这一类间接税被普遍认为具有累退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在财政支出侧，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所占比重较大，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建国初期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整体呈上升趋势，虽然部分年份有小幅回落，但并没有形成收入差距下降趋势。并且，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在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与全球平均水平相一致，在二十一世纪后，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大体上看，我国基尼系数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高收入-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大和财政政策再分配功效不足并存，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分析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通过分解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我们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有以下几个特点：（1）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过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过窄，收入再分配能力有限；（2）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是一项累退性支出，恶化收入分配；（3）股利、红利等在税率上被优待，缺少遗产税和赠与

税，使得政府在“削高”方面缺少手段；（4）社会支出所占比重过低，政府在“把矮个子垫高”方面成效不彰。通过计算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税收政策）前后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值以及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财政政策在收入分配公平性上的效果。结果表明，我国的社会补助政策恶化了收入分配情况，虽然税收政策可以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税收政策税基过窄，改善作用非常微弱。两项政策的总体影响仍然恶化了我国的收入分配情况。

附录：

附表-1 各行业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年份和幅度<sup>①</sup>

行业	超过 GDP 增长率		超过人均 GDP 增长率	
	年份	幅度 (%)	年份	幅度 (%)
建筑业	1998	4.88	1998	5.90
	1999	0.62	1999	1.54
	2009	5.29	2009	5.83
农、林、牧渔业	2002	1.50	1999	0.76
	2009	5.75	2001	0.66
			2002	2.24
			2009	6.29
房地产业	1998	5.35	1997	0.46
	1999	5.07	1998	6.37
	2001	1.61	1999	5.98
			2001	2.41
			2002	0.30
制造业	1998	12.18	1998	13.20
	1999	4.37	1999	5.29
	2000	1.58	2000	2.45
	2001	1.42	2001	2.22
	2002	3.01	2002	3.74
	2003	0.75	2003	1.45

<sup>①</sup>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2009	1.31	2009	1.85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	1998	1.59	1998	2.61
	1999	3.60	1999	4.52
	2000	0.80	2000	1.67
	2001	2.52	2001	3.32
	2002	2.87	2002	3.61
	2003	1.11	2003	1.81
	2009	0.16	2009	0.69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	1998	7.05	1998	8.07
	1999	5.19	1999	6.10
	2000	1.79	2000	2.66
	2001	4.41	2001	5.21
	2002	3.35	2002	4.09
	2005	0.04	2005	0.72
	2009	1.67	2009	2.20
社会服务业	1997	0.79	1997	1.92
	1998	4.65	1998	5.67
	1999	3.96	1999	4.87
社会服务业	2001	4.98	2000	0.80
	2002	3.48	2001	5.78
	2003	12.44	2002	4.22
	2008	0.22	2003	13.14
			2008	0.83
卫生、体育和社会服务	1997	1.00	1996	0.04
	1998	4.74	1997	2.13
	1999	7.72	1998	5.76
	2000	1.90	1999	8.64
	2001	7.84	2000	2.77
	2002	4.54	2001	8.64
	2009	2.25	2002	5.28

			2009	2.79
教育、文化艺术 和广播	1997	0.15	1997	1.28
	1998	5.27	1998	6.29
	1999	9.06	1999	9.97
	2000	2.02	2000	2.89
	2001	11.01	2001	11.81
	2002	6.88	2002	7.61
	2007	0.97	2007	1.61
	2009	7.24	2009	7.78
国家机关	1998	4.39	1997	0.56
	1999	9.28	1998	5.42
	2000	1.23	1999	10.20
	2001	10.35	2000	2.09
	2002	5.05	2001	11.15
	2005	0.80	2002	5.78
	2007	0.12	2005	1.48
	2009	0.83	2007	0.76
			2009	1.37
采掘业	2000	0.15	1998	0.05
	2001	4.19	2000	1.02
	2002	5.47	2001	4.99
	2003	11.10	2002	6.20
	2004	5.38	2003	11.80
采掘业	2005	6.24	2004	6.08
	2006	1.01	2005	6.91
	2008	3.31	2006	1.66
	2009	2.56	2008	3.92
			2009	3.10
批发和零售贸易	1998	13.90	1998	14.92
	1999	3.13	1999	4.05

	2000	1.05	2000	1.92
批发和零售贸易	2001	3.65	2001	4.45
	2002	5.27	2002	6.01
	2003	2.54	2003	3.24
	2004	1.73	2004	2.43
	2005	1.57	2005	2.25
	2008	4.36	2006	0.33
	2009	4.31	2008	4.97
			2009	4.85
金融、保险业	1997	4.08	1997	5.21
	1998	2.75	1998	3.77
	1999	6.08	1999	6.99
	2000	0.09	2000	0.96
	2001	8.07	2001	8.87
	2002	5.59	2002	6.32
	2003	2.42	2003	3.13
	2005	4.62	2005	5.29
	2006	4.47	2006	5.12
	2007	1.11	2007	1.75
	2008	4.32	2008	4.92
	2009	3.51	2009	4.05

## 参考文献

- Anneli Kaasa, Factors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Mechanism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J]. University of Tartu, ISSN 1406 - 5967, 2005
- Dennis J. Snower, Causes of Changing Earnings Inequality [J]. IZA Discussion Paper No.29, 1999
- Edwin Goñi, J. Humberto López and Luis Servén, Fiscal Redistribu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487, Jan. 2008



- Francesca Bastagli, David Coady and Sanjeev Gupta, Income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 [J]. IMF Discussion Paper, SDN/12/08, June 28, 2012
- Gerd Schwartz and Teresa Ter-Minassian,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4(3), 2000, pp.337-358
- Iris Claus,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Violeta Vulovic, Government Fiscal Policies and Redistribution in Asian Countries [J]. Working Paper, Feb. 2012
- Jeffrey Puryear and Mariellen Malloy Jewers, Fisc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 Latin America [J]. Social Policy, Policy Brief No.3, Jun. 2010, pp.1-4
- Jorge Martinez-Vazquez, The Impact of budgets on the Poor: Tax and Benefit Incidence [J].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ug. 2001, Module 10
- Jorge Martinez-Vazquez, Violeta Vulovic and Blanca Moreno-Donson, The Impact of Tax and Expenditure Polici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Countries [J]. Review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2012), pp.95-130
- Mario I. Blejer and Isabel Guerrero, The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2(3), 1990, pp. 414 - 423
- Timothy F. Bresnahan, Computerization and Wage Dispersion: An Analytical Reinterpretation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456), Jun. 1999, pp.390 - 415
-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Norway[R]. Feb. 2012
- 黄祖辉, 王敏, 万广华,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 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03 (3), pp.70-75
- 李吉雄, 我国财政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绩效分析[J], 经济问题, 2010 (12), pp.25-28
- 李绍荣, 耿莹, 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J], 经济研究, 2005 (5), pp.118-126
- 刘怡, 聂海峰, 间接税负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J], 经济研究, 2004 (5), pp.22-30
- 王亚芬, 肖晓飞, 高铁梅,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及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 2007 (4), pp.18-23
- 朱国才, 转移支付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7 (3), pp.94-97